

史学前沿丛书 | 主编 刘新成 岳秀坤

全球史与跨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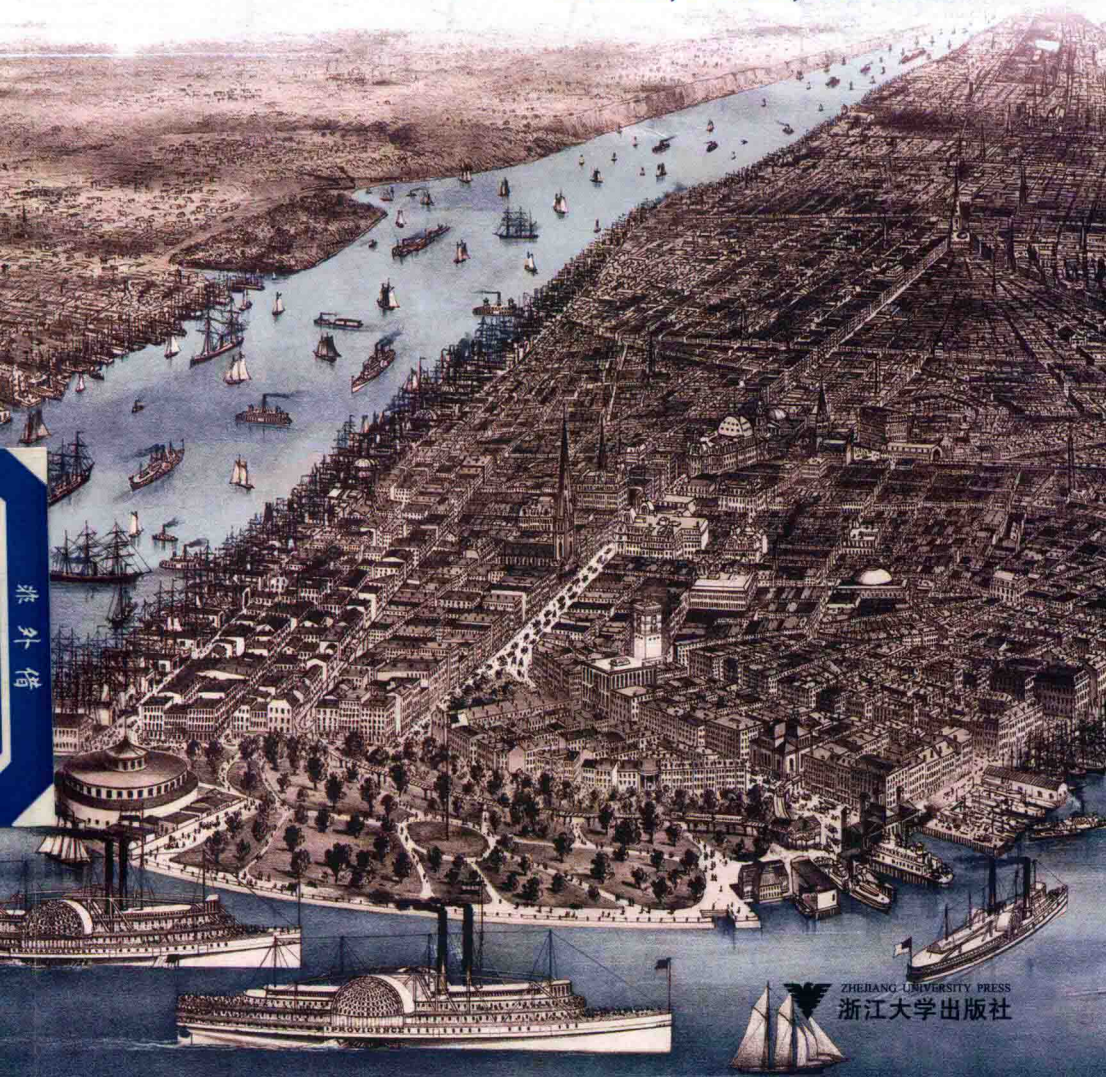
过去, 现在和未来

Akira Iriye

[美] 入江昭 著 邢承吉 滕凯炜 译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海外情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球史与跨国史

过去，现在和未来

[美] 入江昭 著 邢承吉 滕凯炜 译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 / (美) 入江昭著；邢承吉，滕凯炜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9

(史学前沿译丛)

书名原文：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SBN 978-7-308-17809-9

I. ①全… II. ①入… ②邢… ③滕…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5020号

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

[美] 入江昭 著 邢承吉 滕凯炜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伏健强
责任校对 王军 夏斯斯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7
字 数 66千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809-9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刘新成 岳秀坤

编 委

刘新成 刘文明 夏继果 梁占军 施 诚

岳秀坤 金寿福 徐晓旭 孟钟捷 杜宪兵



启真馆 出品

序

徐国琦（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史学工作者而言，一个高瞻远瞩的方法及视野就是利器。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无法也无权改变历史。但是我们可以调整透视历史的角度，修正我们对过去的看法。历史学者的任务是解释历史，揭示被遮蔽的真相。读者手中的这本小书就是一位国际史学大师的指点迷津之作。其半为自身学术历程，半为学术巡礼，以一代国际大师的法眼及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为我们展示国际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并解读最新和最富于创意、最有穿透力的英文著作。

本书作者入江昭先生 (Akira Iriye) 曾长期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为国际学术界国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曾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主席及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并荣获日本天皇勋章 (Order of the Sacred Treasure) 和日本基金会 (Japan Foundation) 奖，一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入江昭先生自哈佛大学退休之后，面对全球史学，深刻意识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惜花宝贵时间，向读者介绍国际史的来龙去脉。从其书名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即可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和宏大目标。这本书所讲述的就是

国际史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虽然题目看起来有点大，但这本书的内容对入江昭先生来说，可谓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此书丝毫没有大而无当的弊端。相信中国读者阅读之后，一定会有融会贯通、豁然开朗之感。

如果说 19 世纪为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20 世纪为民族—国家的历史，21 世纪无疑为跨越民族—国家、跨越文明的世纪，是国际化的世纪。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地球人的挑战，更是历史学者的“危”和“机”。如果我们把握好挑战，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否则就是真正的危机了。对中华民族来说，“危”和“机”尤甚。目前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深。对中国人而言，正确了解过去，可谓至关重要。这本入江先生的近著，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扩大视野，鉴往知来。

入江先生是我多年前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长期以来对我眷顾有加，耳提面命。其道德文章、高风亮节，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两位译者为史学后起之秀，一为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生，一为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两位不顾学业繁重，不辞辛苦，联手将该书译成中文，嘉惠读者，实在难能可贵，可喜可贺。译者嘱我写几句话，于公于私，实在不敢辞。唯愿写在这里的几句话不会倒读者诸君的胃口，反而增加进一步读完此书的兴趣。

前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史（global history）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作为一股学术浪潮，其发展势头已十分明显。这本小书讨论了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史学研究路径的兴起、发展和未来的可能性。应当指出的是，我即将展示的内容并非网罗众家，而只是从不断增多的学术出版物里挑选了有限的、能够反映史学研究变化的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更像是一种带有个人色彩的回顾。此外，我所列举和参考的所有书籍和文章也都来自英语世界；虽然我也参考了一些用其他语言写成的作品，但倘若把这所有的著作糅在一起讨论的话，这本书就变得十分烦琐和冗长。不过，尽管篇幅有限，我还是很希望这本小书能为那些对历史研究的新近动态，尤其是对全球史与跨国史的瞩目进展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点启发。

詹妮·麦考尔（Jenny McCall）是第一个建议我撰写一部介绍跨国史著作的人，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的同仁们也一以贯之地支持这项写作计划，而拉纳·米特（Rana Mitter）则与我一起合编了跨国史系列的所有著作，并慷慨地为我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也要深深

感谢同样具备“跨国”经历的我的妻子和家人，他们一如既往地对我的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启发和支持。

非常感谢邢承吉与滕凯炜肩负起翻译之职。这本小书简明扼要地、以一百来页的篇幅，将最近一些年来我所尝试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许多年前，我从研究单个民族国家历史（美国、英国、中国等）的研究者转变为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史学者。然而我也逐渐发现，国际史仍旧只看重个别国家，研究视角也局限于各国之间的政府往来。过去二十多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历史学家对“非国家行为体”（non-national actors）愈发感兴趣，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组织以及许多跨国个体。不仅如此，跨国层面的互动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瞩目。相比于强调国家间关系的“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而言，“跨国”（transnational）一词更强调国家类别之外的群体，例如女性、孩童、学生、残疾人等等，这些人群在世界范围的经历和普遍存在，使得他们不能简单地被归入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叙事框架。今天的世界尤其如此，移民、留学生、游客等非国家行为体穿行于世界各地。这些群体建立了跨国的关系纽带，其所追求的目标往往也带有跨国的色彩，例如推广跨文化交流、保护自然环境、减少浪费对环境带来的危害。而另一方面，一些跨国行为体，尤其是恐怖主义者，试图摧毁国际社会的政治秩序和整个人类世界所倚赖的社会基础；若要抵抗这样的破坏性行为，人们就需要采取跨国合作。

因此，我相信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并把握其当下的脉搏，我们需要以一种跨国的视角理解人类的历史。民族国家当然仍旧是理解历史一个关键性的解释框架，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的重要性不会降低；然而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跨国纽带也会不断增多。倘若这本小书能帮助读者增强对这类跨国纽带的

理解，并为理解过去与当下诸多现象提供新的视角，那么我将为此备感荣幸，因为它预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全球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中交换意见、共享观念，相较于过去的一个世纪，人类的未来也将更强调相互依存的重要性。

入江昭，2016年7月写于伦敦

目录

- 第一章 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兴起 1
- 第二章 跟不上历史潮流的历史学家 21
- 第三章 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学术史梳理 39
- 第四章 我们从这里走向何方? 77
- 参考文献 91

第一章 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兴起

这一章概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编纂的革命”，集中讨论了全球史与跨国史兴起的历史背景。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前，历史写作主要以国家和地区为研究框架（如美国史、欧洲史），然而近二十年来，历史学家日益关注跨国群体（例如不同族裔、非国家组织等），以及跨国性与全球性的现象（例如人口迁徙、人权等）。在本章的讨论中，我尤其关注国际史如何从单纯讨论国家间的关系转变为跨国史的一部分。

过去25年以来，历史学家对于如何解读历史、讲授历史、编纂历史的认识，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当然，这种个人观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在近代史，尤其是国际事务研究方面的经验，绝非放诸四海皆准之言。不过，同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历史学家有义务不时将自己同前人的研究成果相互参照，以便在学术变迁的脉络中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学习历史，曾亲眼见证过去六十多年以来史学写作的变革，也曾亲身参与到这些变革之中。

随着“全球”（global）、“跨国”（transnational）这些关键词在文章题目和书名里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眼下这新一轮史学浪潮

已然十分明显。这种现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毕竟当时很少有史学杂志讨论跨国和全球性的事务，但现如今使用这些核心词早已是稀松平常之事。这一变化反映出今天的历史学家在理解过去，尤其是近现代史方面，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思想变化。

就在不久以前，历史学家仍旧是在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框架之下研究近代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发轫于 19 世纪的欧洲，彼时“民族国家”正日益成为人类活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等各个维度的基本单位，而历史学本身也被视为研究追溯民族国家如何演变与发展的一门学问。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之下，学者们非常重视政治、宪政、法律这些方面的研究，而与此同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所思所想也作为一个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便是黑格尔所说的除民族意识之外，别无历史可言。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不仅流行于西方世界，同样也为致力于国族构建、建设现代国家的非西方世界所认可。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 Pennsylvania）念本科时，我的研究方向是英国史，曾钻研过都铎王朝（Tudors）和斯图亚特王朝（Stuarts）的宪政发展史，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则是 18 世纪的英国圣公会。现在想来，早年英国史的研究训练为我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我学会了如何阅读一手文献，撰写研究综述，写作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论文。最重要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华莱士·麦克卡弗里（Wallace MacCaffrey）在这一时期曾告诉我们，英国历史（或其他任何一门特定的国别史研究）是一本向全世界开放的典籍，不论研究者出身何地、来自何方。历史研究中有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可作一般化推广的概念，世界各地的学生都能采纳，用以研究各国的历史。当时我的英文水平还不高，又是从日本来的留学生，这位老师的建议对

那时的我而言可谓莫大的鼓励。入门以后，我开始了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生涯，并且接受成为一名职业历史学家的训练，开始登堂入室。那时我的专业方向也从英国史研究转向了美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然而在我这段职业生涯的转型时期，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范式却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历史学——尤其是我与我的同学所接受的近代史训练——仍旧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历史学家对国别史的研究、写作和教学主要围绕着政治统一、宪政和法律发展、经济的现代化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包括宗教、教育、大众娱乐）这类题目，其指向不外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可以说，这仍旧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围绕着民族国家解释近代历史。这类历史叙事模式不可避免地强调每个国家历史、观念、制度的独特性。国家的历史作为珍贵的遗产代代相传，构成了全体公民的共同记忆。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之下，历史学家的使命便是不断深入发掘本民族的传统，并向读者传授本国的历史记忆，而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也因此与“例外论”（exceptionalism）的叙事倾向紧密结合。

当然，作为未来的历史研究者，我们也知道，鉴于现有的、丰富的史学编纂传统，每一代历史学家在看待历史时，不应当只是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职业历史学家的使命应当是对学术领域做出具有“原创性的贡献”，即发掘新材料，补充新方法，提出对一国历史（即便富有争议）的新解释。

我们这代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史学训练的学人，虽长期浸淫于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之中，却也曾目睹历史学界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潮流。以中国史研究为例，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挑战，中国回应”的研究范式，逐渐被“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新范式所替代。虽然尚未跳出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一些学者却

也开始强调中国本土性的思想与制度，如何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思想资源。而在美国史领域，虽然从前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关注政治史的研究，但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社会转向”（social turn）在史学界的兴起，学者们开始日渐关注女性、少数族裔等曾经在政治舞台上的“失语群体”。社会史的研究者试图在其研究中探讨美国历史上的“局外人”，这也使得性别研究、非裔美国史及少数族裔的研究在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成为美国史中的“显学分支”。学者们的目光也不再集中于“当权者”，而是试图将那些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群、少数族裔，以及被美国主流历史叙事边缘化的群体，重新纳入叙事框架之中。这种研究方法仍以民族国家历史为首要对象，但比起政治因素，更加强调社会群体和地方视角；而另一方面，“社会转向”仍旧强调的是一国历史的特殊性与例外性。这是因为“自下而上”（from the bottom up）的研究视角不可避免地使学者们更加关注地方事务的细枝末节，而忽略了更宏大的研究主题与问题意识。虽然历史学家对地方性事务的关注，已然在微观层面修正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然而这类叙事同样使历史学者的研究面过于狭窄，容易遮蔽历史学家对其他国家与世界事务的了解。若是没有对同时期其他国家事务的认识与研究，历史学家便很容易陷入地方事务的细枝末节，从而强调本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社会转向”同时兴起的文化研究也是如此，在强调对单独个体的历史文本（文字或口述资料）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容易倾向于例外论的叙事模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个体所遗留的文本，本身就是某一特定土壤的产物，很难用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进行概括。不仅如此，“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使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从精英文化（艺术、文学和音乐等）转向对大众消费和流行文化的研究，而这些现象无一例外地强调一国一地独特

的、本土化的国民气质或“心态”(mentality)。

毋庸置疑的是，历史学家在其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无法忽略其他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在同一时期的发展。有一小部分学者的确将封建主义(feudal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视为跨国性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然而不同于20世纪下半叶骤然兴起、自立门户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史学的影响范围仍旧十分有限，主要是由不同国家学者对他们的历史研究进行相互比较。它所承袭的仍旧是19世纪以来那套中规中矩的研究路数，主要围绕对一国的对外关系或外交史展开研究，史学家需对主权国家的决策过程了如指掌。比较史学的历史学家通常关注的问题包括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外交关系、战争与和平。外交政策是这一类型研究的核心框架；每个国家都对国家利益有着不同的界定，或使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或通过武力，维护自身的利益。由于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不同，难免会产生潜在的冲突源，这就需要各国通过条约和协定进行协商。如果类似的协商没能成功的话，战争就会爆发，而一旦战争结束，参战国又要重新界定自身利益并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国别的差异，就一直这样循环往复下去。

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外交史研究，需要阅读多国档案，深入了解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动机，探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当时研究的是20年代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专著《帝国主义之后》(*After Imperialism*)；此书其实是一篇传统的研究论文，我在阅读各国政策制定者已公开或私人的文献的基础之上讨论了国家间的关系。)^[1]6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向”极大

[1]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5).

地扩展了外交史研究的视角，而外交史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普通民众在公共舆论、党派与利益群体等各个方面的参与，如何进一步影响了高层的决策过程。“文化转向”更进一步激发了大众想象与认知方面的研究，探讨一国国民如何看待其他国家、理解本国立场并界定本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即便如此，类似的研究仍旧没有跳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框架。以美国外交史为例，即便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在讨论决策制定者的同时兼顾公共舆论，这一学科仍以美国对外关系史为基本的研究框架。（此外，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基本上仍旧只参考英语世界的档案资料，即便是冷战史的研究也很少运用苏联方面的资料，更少参考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文献。）

然而自 70 年代以来，外交史（或曰对外关系史）却日渐被称为“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美国对外关系史协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于 1979 年创办《国际史评论》（*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杂志，它同该协会 1977 年创办的《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杂志均为该领域的核心刊物。虽然《外交史》杂志的编辑仍使用了传统的刊名，但不少经他们推介发表的文章却远非传统的外交史，而更像是“国际史”的研究。“国际史”这个范畴，英国学界较为熟悉，但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国际关系史”（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说法更为普遍；在此之前，美国大学里类似的课程通常以“美国对外关系史”（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为题，而“国际史”所指不过是所有国家，或者至少是几个大国间外交关系的总和（然而到 80 年代中期，连我也把“美国对外关系史”的课程名更改为“国际史”）。从“外交史”到“国际史”的这一变化，至少显示出外交史学家开始试图超越国家制定政策和对外策略方面的讨论，而日渐关注世界各国如何基于自身利益而塑造世界秩序。

但即便如此，国际史仍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叙事单位，而在考虑世界事务之时，也更偏重于强调“大国”所扮演的角色。国际史的历史年表依旧是由一些关键性的军事和外交事件所划定的。众所周知，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后，1815年维也纳会议定下的“维也纳体系”（Vienna system）界定了当时欧洲的政治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胜国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催生了所谓的“凡尔赛体系”（Versailles system）；该体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面崩溃，而在20世纪20年代主导亚太秩序的“华盛顿体系”（Washington system）也随着亚洲地区的冲突而宣告瓦解。正如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会谈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为美苏冷战这个“非战争，也非和平”的“两极化”（bipolarity）权力格局埋下伏笔。当然，类似的历史年表所偏重的，仍旧是西方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大关注欧洲的小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国家。尽管威廉·凯勒的《20世纪的世界》（William Keylor,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1983）不失为一本有用的研究指南，但它大致没有跳出类似的叙事框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1987）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史方面的经典著作，该书详尽地论述了16世纪以来世界上主要的强国（奥地利、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是如何兴起，又如何转而衰落。肯尼迪似乎也预言了苏联的解体，不过类似的评论对80年代而言为时尚早。肯尼迪还对未来可能挑战美国的力量（中国、日本、欧共体等）做了探讨。他的作品不仅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吸引了那些关注美国未来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的读者；而另一方面，肯尼迪对各个大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比较分析，也使得本书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国家叙事框架下国际史研究的典范。